

李元瑾序

陈六使：一生荣辱系于南大

从中国乡下的贫农到东南亚社会的富商，从半途辍学的小学生到栽培上万社会栋梁的大学创办人，陈六使的一生与20世纪新马华人社会和东南亚华文教育紧密相连。然而他生命中的荣辱，不在于商，而在于学，更在于南洋大学。

陈六使的浮沉、南洋大学的起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和环境的复杂。二次大战后的东南亚，需要陈六使、也排斥陈六使，需要华文大学、也排斥华文大学。东南亚是中国境外华人的最大集中地，该地区的华文教育，在殖民地时代蓬勃发展，纵使经历了日本统治的逆境，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间也迅速复苏。然而，随着冷战时期的到来、东南亚政治氛围的变异，华文教育的发展即跌入了回光返照的历史情境。

首先，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疏离导致该地区师源中断、华校生深造无门，华校需要应变，以求突破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南洋大学的所在地——新加坡，华校小学一年级报读人数在四大语文源流（中、英、巫、印）小学中占据的百分比正在持续下降，华文教育前景暗淡。其次，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强化了殖民地时代已形成的种族矛盾和语群对立，走在自主独立的道路上，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因为族群文化的坚持而深受质疑；加上各方权益的角逐，问题更为复杂化，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遂被置于政治火炉上反复烘烤。陈六使，就在这样一个充满诡异的历史情境中创办南洋大学，不仅筹建过程中遭遇多方阻挠，在发展阶段也面对满途荆棘。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路难行。它受制于多种因素，其中两大因素尤不可忽略，一为客观因素——历史遗留与现实格局交织下的政治与教育纠葛，一为主观因素——主角人物的办学认知、行事作风和政治敏感度。

教育与政治纠缠不清，是南洋大学长期面对的困扰。陈六使带领的华人社会，认为传播中华文化、发展华文教育，可以为马来亚文化的发展和当地人才的栽培作出贡献；而殖民地政府、马来族群和部分英文教育者则不以为然，他们坚称种族和谐和国家建构将因此受到破坏。后者甚至再三将“中国意识”、“共产主义”跟南洋大学捆绑在一起。为了消解政治疑虑，也为了大学健康发展，陈六使一再强调校内师生不可从事政治活动。但是，客观的发展由不得陈六使，南洋大学始终摆脱不了政治的缠绕。当政府以大学改制作作为资助经费的条件时，学生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并且在短时间内从教育的争执演变成政治的抗衡。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的大选是抗争的高潮，陈六使、学生会和南大生，都陷入政治泥沼。大选次日，陈六使的公民权被政府褫夺。第二年，他退出大学领导层，离开了奋斗14年的南洋大学。

陈六使是个成功的商人，魄力、胆识、经验、机遇等使他在商场上脱颖而出。商而优则办学，是一般华社领袖必经之路。但是，一个小学学业都没完成的商人，在冷战时期于中国境外办华文大学，还要亲自处理校务、跟学者打交道、跟政治人物较劲，谈何容易？而他身边的幕僚，也同样缺乏办大学的相关经验。当陈六使将自己的经商理念和行事风格转移到南洋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上，许多问题就产生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跟首任校长林语堂的矛盾。他为了成功聘请到在美国颇有名气的林语堂，一再应承对方提出的有关“钱”与“权”的条件。但是，林语堂南来后不久，双方就为了两千万办学经费没能筹足、校长与校董职权无法划分而发生争执，内耗了将近半年，最终不欢而散。这场纷争对草创时期的大学

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对之后行政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再一个重要例子是陈六使对大学学位的认知。他没能及早认识到政府承认南大学位的重要性，以及殖民地政府以此为“杀手锏”来左右大学发展的意图。他错过了在马绍尔政府时期——大学与政府的蜜月期——争取学位承认的良机，终使学位问题后来成为大学与劳工阵线政府和人民行动党政府争执的焦点。

陈六使的南洋大学之路，路难行。但陈六使以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气走过了，展示了成功商人的果断和气魄，以及企业家敢于冒险的胆识和勇于拼搏的精神。林语堂曾说过：“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但不能无陈六使”。我们不禁要问：20世纪50年代的东南亚，如果没有陈六使，会有另一位华人领袖率众创办一所华文大学吗？或者，如果50年代没有南洋大学，60年代会有可能出现一所华文大学吗？历史没有“如果”，但是作出一些假设，有助于我们评价历史人物。

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不仅让成千上万的华人子弟不至于深造无门，而且为新马两个新兴国家栽培了工、商、文、教、政等各界急需的人才。同时，在短短数年内，协助世界许多著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培育数以百计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根据统计，南洋大学前八届（即1960年至1967年，政府在1968年才承认南洋大学学位）的3324名毕业生中，就有414位（12.6%）在国外著名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即210人获博士学位，204人获硕士学位，其中超过80%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受聘为教学人员或研究人员。¹ 对于一所新办的、民办的华文大学来说，这确实是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陈六使是一个传奇人物，南洋大学是一则神话故事。在东西方冷战的年代、在共产主义和种族主义延伸的东南亚、在英文至上

¹ 郑奋兴《郑奋兴讲南大故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11），页13。郑奋兴博士引用了王慷鼎博士的研究成果。

的新加坡，陈六使创办华文大学是一种历史远见？还是一种时空失察？陈六使个人的办学理念与认知，以及商人的行事作风，对一所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利如何？弊如何？陈六使与林语堂之间的冲突、陈六使与新加坡政府的博弈，双方的得失何在？是非何在？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产生了大批受挫、受伤的“沉默的大多数”，但也为新马两地的国家和华人社会培养了许许多多各领域的人才，并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南大精神”。历史应该如何给他公正的评价？

陈六使倡办南洋大学，迄今已六十载。他一直活在南洋大学校友们的心中，也时而会出现在校友们的笔下。一些学者（校友或非校友）也尝试从某一角度，论析他的商业成就、或国家认同、或教育贡献。至于聚焦于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的著作，虽有几篇文章陆续出炉，但学术专著几乎等于零。这一现象，跟创办厦门大学的新加坡先贤——陈嘉庚比照，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政治忌讳造成？还是感情纠结所致？抑或是史料缺乏的结果？无论如何，历史空白的那一页，正等待着学者来填补。就在60年后的今天，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出版了利亮时的专著——《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以此作为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的一份献礼。

踏入21世纪，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推出南洋大学历史研究计划，鼓励有志者申请研究生奖学金从事南洋大学研究。利亮时成功获选。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以“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为研究题目，而且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四散的史料？如何抛开许多顾虑而能客观地选材和书写？

利亮时为人憨厚，人缘颇好；做事勤勉，不怕辛苦。这使他在进行口述历史和搜寻文献资料时获得不少帮助，找到许多珍贵资料。这本《陈六使与南洋大学》，史料甚为丰富，包括陈六使的言论、陈六使与他人来往的书信、南洋大学在相关阶段的文献、中华

总商会和福建会馆的会议记录、口述历史资料、官方档案资料（包括英国殖民部、新马殖民政府时代的档案和官方的来往书信）、新马两地的中、英、巫文报章，以及一些期刊杂志。因此，本书的一项贡献，就在其搜集、发掘到多种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

利亮时为学认真，而且敢于尝试。他选择研究陈六使，是一项拓荒式的任务，需要加倍的努力。这项研究，对于南洋大学和陈六使来说，同样重要，因为它覆盖了南洋大学前半段历史的颠簸和陈六使中老年时期的起落。《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一书，就是将大学发展与人物角色结合起来，顺着历史脉络，分五个区块——陈六使在华人社会的崛起、创办南洋大学的动机与阻力、与林语堂的矛盾与冲突、南大学位不受政府承认的问题、陈六使与政府就南大理事会主导权之争，着手探讨。每个区块，作者都根据重要史料，作多方的钻研及合理的呈现。

利亮时在撰写论文和修订专著的过程中，不忘最初的约定：“尽量避免以情治史或因为压力而随意改变历史”。因此，翻阅《陈六使与南洋大学》，读者即可感受到他为了尽量维持客观所作的努力。在最后一章〈结论〉里，他对陈六使的得失成败作了一番论析，一方面对陈六使加以肯定和辩护，包括肯定陈六使对新马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的贡献，以及阐明陈六使卷入政治漩涡与共产党并无关联；另一方面则指出陈六使的过失与不足，包括他对于政府承认学位的认知和对政治形势的掌握，以及他在经费、管理和行政等诸事的筹划与安排。

《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是一部开创性的学术作品，并自成一研究体系。其实，作者于2005年完成的题为“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筚路蓝缕的办学之路（1950-1964）”的博士论文，已获得校外考委颜清煌教授的赞赏。本书就是作者反复修订当年博士论文后的成果。当然，就像其他的学术专著一样，学者和读者都会对书中的许多论述产生更多的联想和追问，于是浮现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和

探讨的问题。仅从人物的角度来谈，陈六使在掌管南洋大学期间，他与周遭人物的关系与互动——陈六使与南洋大学学生、陈六使与智囊团、陈六使与商界领袖、陈六使与政治人物等，都可以深入研究。换言之，“陈六使与南洋大学”这一大块的研究课题，还有开拓的空间。未来的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即便是利亮时，也可以有新的想法和新的尝试。希望利亮时不会就此而满足，继续为有关研究的拓展与提升，作出努力。

云南园，2012年7月